

# 第一章

## 什么是修辞学？

### 1 修辞学与 rhetoric

顾名思义，修辞学是关于修辞的学问，所以要想界定修辞学，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修辞。《现代汉语词典》（2002：1416）将修辞解释为“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进而将修辞学定义为“语言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如何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辞海》（1979：554）对修辞的解释是“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恰当地表现写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一切活动”；与此相应，《辞海》对修辞学的定义是“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它研究如何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它揭示修辞现象的条理、修辞观念的系统，指导人们运用和创造各种修辞方法恰当地表现所要表达的内容”。与《现代汉语词典》相比，《辞海》的定义一方面涵盖了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另一方面突出了“依据题旨情境”的“恰当”表达是修辞追求的目标，也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再来看看几位现代和当代的汉语修辞学家对修辞和修辞学的理解。据吕煦（2004：4）的引述，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1979）中将修辞定义为“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適切的一种努力”；张弓（1963）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则认为“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

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杨鸿儒在他的《当代中国修辞学》（1997）中对陈望道和张弓的观点进行了整合，提出修辞是“通过对语言材料的选择、调整、修饰，使语言美化，更好地交流思想，表情达意”，并将修辞学界定为“研究如何提高语言表达艺术效果的规律的科学”。

人们通常认为，汉语的“修辞学”与英语的 rhetoric 相对应，但其实我们所谓的修辞学与西方人的 rhetoric 有很大区别。rhetoric 的拉丁语词源是 *rhetorica*，希腊语词源是 *rhētorikē*，两个词的意思都跟演讲有关，而这一点并非偶然，因为西方修辞学，尤其是西方古典修辞学，首先是对演讲艺术的研究（胡曙中 2007：1—2）。这一传统在当代西方修辞学，尤其是美国的修辞学研究中仍有体现。

在英语中，rhetoric 既可以作为专有名词使用，也可以作为普通名词使用。据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 (1987: 1245), rhetoric 的第一个意思是：

speech or writing that is presented in a forceful and dramatic way which appears to be clever and important; often used showing disapproval  
e.g. She simply ignored his bluster as empty *rhetoric*.

The liberalism of their rulers was a *rhetoric* masking vicious exploitation.

第二个意思是：

a grand, poetic way of speaking which once used to be practiced as an art  
e.g. the somber *rhetoric* of *Hamlet* and *Othello*  
the art of *rhetoric*

我们更关心的当然是作为专有名词的 rhetoric。《*The World Book 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the art of using words in speaking or writing so as to persuade or influence others”（转引自吕煦 2004：3）；《*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则将其定义为“the art of effectively using language in speech or writing, including the use of figures of speech”（同上）。

当代西方不少修辞学家也尝试对 rhetoric 做出界定。例如：

Rhetoric is a kind of art which deals with how to manipulate language effectively. (Brooks & Warren 1972: 5)

What rhetoric concerns is how to make an effective choice between two synonymous expressions. (Steinmann 1967: 21—22)

Rhetoric should study the misunderstanding in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find a solution to it. (Richards 1936/1965: 3)

另外，Marie Hochmuth Nichols (1971) 将 rhetoric 定义为“组织语篇的手段，以对听众或读者产生效果”（“a means of so ordering discourse as to produce an effect on the listener or reader”，as quoted in Corbett 1990: 1）；Kenneth Burke (1962: 567) 的定义是“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来使用，以诱使人们进行合作，因为对符号做出反应是人类的本性”（“the use of language as a symbolic means of inducing cooperation in beings that by nature respond to symbols”）；而 Donald Bryant (1965: 7) 认为 rhetoric 是“使观念和受众彼此适应的手段”（“the function of adjusting ideas to people and of people to ideas”）。

上述定义可谓五花八门。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与其说学者们在定义 rhetoric，不如说他们在从各自关注的角度来阐释自己对 rhetoric 的理解。从他们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英语的 rhetoric 跟汉语的“修辞”是有偏差的：首先，汉语的“修辞”没有作为普通名词使用的 rhetoric 所携带的贬义；其次，汉语的“修辞”不像英语的 rhetoric 那样与演讲术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汉语的“修辞”不像英语的 rhetoric 那样强调以劝说 (persuade) 为目的。这些差异导致汉语修辞学和英语修辞学在研究范围、研究重点和研究视角上都不完全重合。

吕煦 (2004: 4) 对中国学者关于修辞和修辞学的界定作了很好的总结，认为“修辞是最有效地运用语言以期更充分、透彻、鲜明地表情达意的一种艺术。研究这种艺术的学问，就叫做修辞学。修辞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题旨和条件下如何对语言素材进行调整、加工、润色，如何运用修辞方式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学科。它旨在探讨修辞规律和方法，并将它们上升到理论高度以具体地指导语言实践”。而英语的 rhetoric，笔者倾向于将它粗略地界定为 the art of effectively using language in speech or writing, including the use of figures of speech and the cultivation of different styles, so as to persuade or influence others。本书以介绍英语修辞学为主，并尝试运用英语修辞学理论对体现在不同文体中的英语和汉语的修辞现象进行分析，同时辅以汉语修辞学的一些独特的观点。

## 2

## 回望历史

本节我们将简要介绍修辞学在西方和中国所走过的不同发展历程，并总结这一发展历程中所出现的人文传统与文体风格传统。

### 2.1 西方修辞学

顾曰国（1990：13）把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分为六个主要阶段，分别是：1）古典修辞学（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两个时期，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2）中世纪修辞学（从罗马帝国覆亡到文艺复兴，即公元476年到公元1416年）；3）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15、16世纪）；4）新古典主义修辞学（17、18世纪）；5）19世纪修辞学；6）现代修辞学。

从现存的古希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西方修辞术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各种演讲实践，在对演讲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西方修辞学的雏形得以产生。最早的修辞学尝试大约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西西里岛，当时锡拉库萨（Syracuse）的暴君色拉西布洛索斯（Thrasybulus）被推翻，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民主政府。获得自由的公民潮水一般涌向法庭，纷纷要求收回自己在暴君统治期间被没收充公的资产。由于人们大多无法提供正式的文件来证明自己的要求实属合理，所以在法庭上他们只能利用自己雄辩的口才来打动和说服法官。在这样的官司中，善于在大庭广众抛头露面进行演讲的人当然占据上风，这令广大民众迫切感受到提高演讲技巧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拉克斯（Corax）第一个对演讲修辞进行了总结，探讨了如何从或然性中形成论点，并指出法律演讲一般可分为四个部分，即 *proem*, *narration*, *arguments* (both *confirmation* and *refutation*) 和 *peroration*。这一划分对后世的演讲修辞学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Corbett 1990: 540）。

之后，高尔吉亚（Gorgias）、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继承和发展了科拉克斯创立的修辞学，并最终形成了希腊古典修辞学体系。这一体系将演讲分为三大类，即议政演讲（*deliberative oratory*，力图证明采取某一将来行为是正确可行的，并且劝说听众做出积极的反应来支持相关政策的制定）、法律演讲（*forensic oratory*，力图证明某一过去行为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并且劝说听众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判断）和宣德演讲（*epideictic oratory*，赞扬现时或过去的某一行为是高尚的，并且劝说听众将其发扬光大）；将演讲的准备和实施分为五

个步骤，即觅材取材（invention）、布局谋篇（arrangement）、文体风格（elocution）、记忆（memory）和呈现（pronunciation）——这便是著名的修辞五艺。在古典修辞学体系的创立过程中，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最大，也最持久，他的《修辞学》一书是现存最古老、最具影响力的修辞学专著，被视为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基石，我们将在第二章单独介绍。

到了古罗马时期，西塞罗（Cicero）和昆提利安（Quintilian）把古希腊修辞学拉丁化，并将其推向了新的高峰，完成了西方修辞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即古典修辞学时期（从莱庭、徐鲁亚 2007：13）。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修辞学家和演讲实践家，他的修辞学研究超越了对修辞语篇的结构考虑，更注重影响受众的信仰与行动的劝说方式。他在《论雄辩术》一书中把修辞学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为了劝说的目的，演讲的艺术完全依靠三件事：证明我们的论断；赢得听众的欢喜；激发他们的情感以便产生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一种驱使”（同上：27—28）。昆提利安则将修辞学推向“教育纲要的中心学科”的地位，视演讲为人类最高的才能，甚至认为“善于言辞的好人能够拯救国家”（同上：29—30）。总体而言，在古罗马时期，演讲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武器，研究演讲术的修辞学则被视为帮助组织公共生活的重要艺术。

综观整个古希腊时期和古罗马时期，古典修辞学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人文的、口头的和劝说性的（顾曰国 1990；从莱庭、徐鲁亚 2007：16）。所谓人文的，即修辞活动被看作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所谓口头的，即公众演讲被视为修辞活动的至上形式，演讲词被视为至上的修辞话语；所谓劝说性，即演讲者以劝说听众对某一行为或观点做出积极反应为目的（顾曰国 1990：13—14）。

在古罗马帝国后期，随着民主制度的衰亡，公开演讲，尤其是公开的议政演讲和法律演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宣德修辞遂成为修辞教育的核心。这导致修辞学逐渐脱离具体的内容，转而关注风格的锤炼和词藻的修饰。换言之，文体风格传统逐渐取代了人文传统。相比后者，文体风格传统重表达，轻思想；重审美，轻社会功能，“着眼于奇特、新颖、华丽的表达手段和由此形成的文体风格”（同上：15）。这一特点在中世纪的修辞学研究中被继承并巩固。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由于宗教统治的禁锢，修辞学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陷入徘徊不前的低谷。修辞主要被应用于书信写作和散文写作（从此修辞和修辞学都背离了最初的口语传统），再就是用于布道。神职人员成为修辞活动的主角，修

辞学也因此成为教会进行宗教活动的工具。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奥古斯丁是一名主教，同时也积极从事修辞学教育。他鼓励以古典修辞为基础建立基督教的宣教修辞，由此开启了布道修辞学。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也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在长期的停滞不前后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修辞学出现本土化倾向，英国、法国等都建立了本族语的修辞学，并且分成不同的学派。一个是传统派，该派继承了古典修辞学的人文精神，以修辞五艺为主要研究对象；另一个是文体风格派，这一派把五艺中的前两艺（即觅材取材和布局谋篇）剔除出修辞学，而只专注于后三艺（即文体风格、记忆和呈现）的研究，尤以文体风格研究一枝独秀。还有一派进一步将关于文体风格的研究压缩为关于修辞格 (figures and tropes) 的研究，因而被称为修辞格派 (从莱庭、徐鲁亚 2007: 41—44)。无论是文体风格派还是修辞格派都关注辞格的分类和新辞格的挖掘，但是也都把辞格仅仅视为一种单纯的语言装饰，而忽视了辞格所携带的认知和劝说功能。

进入启蒙时期后，人们更加崇尚科学，追求理性，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这一时期修辞学的发展上。启蒙时期的修辞学又称新古典主义修辞学 (neo-classical rhetoric) (同上: 47)，因为它既体现出强劲的古典主义倾向，把修辞五艺视为修辞学研究的基础；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将文体风格与文学创作及评论紧密结合。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三位跨世纪的修辞学家：George Campbell, Hugh Blair 和 Archbishop Whately。Campbell 的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1776/1963) 被后世公认为 18 世纪最重要的修辞学著作，在书中 Campbell 将修辞学提升为“关于人性的科学” (the science of human nature)，把修辞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以一种提供信息的，令人信服、令人愉悦、令人感动和富于说服性的方式作用于听众的灵魂” (operate on the soul of the hearer, in the way of informing, convincing, pleasing, moving, or persuading) (从莱庭、徐鲁亚 2007: 49)。

19 世纪是西方修辞学再次进入低谷的时期，一方面古典修辞学的人文传统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另一方面文体风格传统也被摒弃，这使得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越来越狭窄，逐渐走入了死胡同。在这一时期，对书面语和写作的重视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口语和口头演讲的兴趣，而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在从五艺变为三艺又进一步压缩为修辞格后，领地急剧缩小。胡曙中 (1999: 496) 和从莱庭、徐鲁亚 (2007: 57—60) 将这一

时期修辞学的衰败归纳为四个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对文体风格的特别关注导致“修辞学的范围既被缩小了又被分散了，缩小到着重于对风格的研究，分散到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而不是对演讲的积极生成”（胡曙中 1999：496）。二是修辞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比其他任何学科都难以专业化，而这与 19 世纪学科的专业化趋势相悖。三是对书面语写作的重视削弱了口头演讲的影响力。四是自中世纪以来对文体风格的过度强调导致了另一个极端的出现，即对文体风格的强烈反感。在美国，一些人开始反演说、反想象、反情感、反感觉，对修辞完全失去了兴趣；而在欧洲一些国家（如瑞士），人们甚至“视修辞为洪水猛兽，视修辞为误入歧途”（从莱庭、徐鲁亚 2007：59）。

20 世纪则见证了修辞学的全面振兴，修辞学与语言学、人际交往学、哲学、文学批评、文章写作等相结合，呈现出跨学科横向发展的态势，出现了修辞哲学（Richards 1936）、动机修辞学（Burke 1969a, 1969b）、小说修辞学（Booth 1961）、修辞批评方法论（Black 1965）、论辩修辞学（Perelman & Olbretchts-Tyteca 1968）、对抗修辞学（Scott & Smith 1969）、认知修辞学（Scott 1967）、描写修辞学（Leech 1969）、文体学（Leech & Short 1981）等诸多流派（顾曰国 1990：16）。顾曰国（同上：22）认为将这些流派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西方的“修辞学思维方式”，即“目的论型思维”。例如，修辞学研究语言符号不同于语言学，它总是把语言的使用跟使用目的及效果联系起来；修辞学研究文学不同于文学批评，它把文学作品视为手段，影响读者为其目的，分析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便构成了修辞分析，等等。这种思维方式是西方修辞学两千多年发展历程中的不变成分。

## 2.2 中国修辞学

易蒲、李金苓（1989：4—5）对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做了精当的概括：“综观我国古代修辞学史的发展脉络，除先秦着重于口语修辞、论辩修辞外，自汉代后便转入书面语修辞。魏晋南北朝的修辞理论将骈体文与诗赋修辞论包含在一起。至唐代开始了诗的修辞论和散文修辞论的独立，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宋元及明清时期则产生了戏曲、小说的修辞理论。所以我国古代修辞学史，除口语修辞外，就书面语修辞论而言，主要贯穿着文论修辞论、诗论（包括词论）修辞论、戏曲修辞论、小说修辞论等四条线。”

易蒲、李金苓（同上）把汉语修辞学史划分为萌芽期、奠定基础期、初步建立期和发展期等几个阶段。先秦和两汉为修辞学的萌芽时期，修辞论在这一时期的特点可概括为零珠碎玉，散落在经书、诸子论著及对经书的注疏中。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在阐述哲学思想时会顺便谈到语言表达形式，论及修辞原则和修辞手段。虽是片言只语，却十分精当。例如，《墨子》的《小取》篇对论辩修辞进行了精辟的总结；东汉的王充则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写出了我国最早论述修辞手法的专篇——《语增》、《儒增》和《艺增》。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论辩和游说盛行的时代，因此先秦的思想家既重视书面语修辞，更重视口语修辞。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诸侯割据，战乱迭起，兼并频发，天下大乱，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势力都迫切需要修辞。例如，外交活动需要修辞，“不论是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还是屈完面折齐师、王孙止楚问鼎，都因舌辩过人而取得显著的效果”（同上：30）。其次，知识阶层的晋升需要修辞，例如，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兜售合纵之说而挂上六国相印；张仪宣传连横之说，被秦惠王“封仪五邑”；商鞅、李斯均因游说成功而登上宰相的宝座；毛遂说楚王与赵合纵而受到平原君的推重，等等，以至于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评价战国时期辩士的作用时，感慨“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第三，百家争鸣也需要修辞，因为不论是何种问题的争鸣，也不论是以口头的舌辩还是书面的笔战来展开论争，都离不开修辞。无论是孟子、荀子，还是庄子、惠施，个个都好辩且善辩（同上：31）。但是到了两汉时期，随着权力的高度集中，统治阶级不再鼓励（甚至不再允许）论辩和游说，学者们的关注也从口语修辞转移到书面语修辞，开了中国历史上只重视书面语修辞的先河。这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国的修辞理论都是只重视书面语而不重视口语，甚至在当代仍然如此（同上：6—7）。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是中国古代修辞学奠定基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修辞研究的领域得以拓展，修辞理论得以全面成长。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表现出如下特点（同上：118—122）：一是“‘清谈’蔚成风气，修辞受到注目”。魏晋南北朝前后跨越约300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最久、动乱最长的时期。动荡的时代带来了思想文化的剧烈变革，表现在学术思想上就是由崇尚经学转为重视玄学，议论玄理的“清谈”成为名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文人学士关注言语辞藻



和音调的美妙，从而推动了修辞理论的探索。二是“文学独立，带来修辞形式美研究的热潮”。在这一时期，文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极大地推动了对语言形式美（包括辞采美、对称美、建筑美及音乐美）的研究。诗歌方面，从建安五言诗到西晋、东晋初的玄言诗，再到晋末宋初盛行的山水诗、对偶诗等，都讲求辞采声色，用典之风泛滥。散文方面，自建安以来骈体文盛行，发展到后来，更是以追求对偶、用事、辞采、声律为能事。三是“佛教传入，促进了声律美的研究”。佛教徒们在宣传佛经时，受印度声明论的影响，总结出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进而发现汉语存在着声律美，并将其运用到文学和修辞中，形成了修辞的抑扬美、音乐美。四是“注重文体和作品风格的探讨”。这一时期除继承了秦汉时已经产生的诏令、奏疏、议策、书表、书传及说明文等文体外，又产生了骈体文等新文体和回文诗等新诗体。曹丕的《典论·论文》全面提出文体分类理论，并对多种文体的风格进行了精当的概括。五是《文心雕龙》问世，奠定了古代修辞学的基础。这部著作论述了修辞的原则、修辞手法、字句篇章修辞、修辞的音乐美、修辞鉴赏、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奠基石。

到了隋唐时期，汉语修辞理论开始一分为三，出现了诗论修辞、文论修辞和史论修辞三个系统，为古代修辞学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修辞学研究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同上：176—181）：一是“古文运动促使散文修辞论发展”。古文运动是一场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的运动，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对六朝的浮华文风进行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古文家们所做的探讨便形成了散文的修辞理论。二是“唐诗发展促进诗论修辞的独立”。不仅一些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会偶发关于诗歌创作的议论，而且还有一批诗人（如上官仪、王昌龄、司空图等）留下了专讲诗律、诗格的著作。唐代诗论修辞既关注修辞理论，又关注修辞方式，不仅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还波及到海外。三是“史论修辞著作——《史通》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评专著，作者刘知几围绕以“直录实书为贵”的宗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辞原则及修辞技巧。

宋金元是古代修辞学初步建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新古文运动的兴起推动散文修辞论进一步发展，而南宋陈騏《文则》的面世则标志着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初步建立。这是我国第一部论述修辞的专著，不仅“对象明确，初具规模”，而且对修辞理论、修辞规律都做了有深度、

有新意的探讨，并论述了文体分类以及不同文体或同一文体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此外，在这一时期诗话修辞大量涌现，学者们结合诗例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促使微观修辞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同上：262—268）。

明清两代是古代修辞学的发展时期。在明朝，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由盛转衰，逐步走向没落。这一时期的诗坛、文坛由于被复古模拟之风所笼罩，无论是诗论修辞还是文论修辞都进展不大，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反映市民要求的文学艺术形式（如戏曲、小说）逐步繁荣，促成了戏曲修辞和小说修辞的迅速发展。明代的戏曲修辞论强调语言的通俗化，对文词和音律的关系展开论争，并随着王骥德的《曲律》的问世诞生了我国第一个戏曲修辞论体系。明代小说修辞论以李贽、叶昼、冯梦龙等为代表，主要形式是小说评点，研究者直接从作品出发，将自己的见解写在作品的空白处，随作品一起流行于世（同上：369—373）。到了清代，各种学术思想吸收历代成果而集大成，修辞研究也不例外。戏曲修辞方面，李渔的《李笠翁曲话》出版，提出了我国古代戏曲研究史上最完整的体系；而金圣叹对《西厢记》修辞的评点则将我国古代戏曲评点修辞推到顶峰。小说修辞方面，凡是古代著名的长篇小说清代都有人进行修辞评点，尤以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成就最高。此外，清代的诗文修辞论也继续全面发展，学者们各自从古文、经学、史学等视角论述修辞，“雅洁”原则的提出和阳刚、阴柔两大风格的划分都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同上：452—456）。

进入20世纪后，西方修辞学逐渐被介绍进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既有学者模仿日本修辞学（如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卷就是主要模仿岛村抱月的《新美辞学》），也有学者模仿欧美修辞学（如唐钺的《修辞格》体系就是仿照英国人 Nesfield 的《高级英文写作》建立的），当然也有学者继续推崇中国古代的传统修辞学。1932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面世，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正式建立（同上：551—553）。此后，关于修辞理论、修辞手段和规律以及文体风格的研究都趋向系统化。建国后，修辞学研究注重通俗，修辞知识得到很大普及（同上：588）。简言之，从偏于模仿到洋为中用，再到融中外古今于一炉、兼具汉语特色的修辞学著作的出现，当代中国的修辞学研究正走在一条充满荆棘和鲜花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

## 2.3 人文传统与文体风格传统

在上面的历史回溯中我们已经指出，西方古典修辞学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个传统，即人文传统与文体风格传统，后者是从前者分离出来的（顾曰国 1990：13）。本节我们对这两大传统的并存和分野做更进一步的介绍。在人文传统下，修辞活动被看作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人是理性的动物，同时又是政治动物（Aristotle, *Politics*, 1253a: 3-4）。在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作为理性的动物，人们总还是希望通过理性的方式来施加影响，实现制约，这种理性的方式就是劝说（persuasion）。亚里士多德把通过说理和辩论来劝说他人做出某种反应的活动定义为修辞活动，这种修辞活动即是西方古典修辞学的核心内容（顾曰国 1990：14）。

强调人文传统的古典修辞学还有一个特点，即认为修辞活动应受伦理道德的制约。这是因为修辞活动作为修辞者向受众施加影响的劝说性活动，其影响可以是向善的，也可以是向善的，如果修辞者不是品行端正的人，如果修辞活动脱离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的制约，那么就很可能被恶人用来危害社会，荼毒百姓。

与人文传统相比，文体风格传统强调奇特、新颖、华丽的表达手段和由此形成的文体风格，表现出重表达、轻思想，重审美、轻社会功能的倾向（顾曰国 1990：15）。文体风格传统从人文传统分离出来有其历史的原因：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解体，寡头政治取而代之；公元前3世纪，希腊并入古罗马帝国的版图。政体上的变迁反映在语言和修辞上，便是议政演讲和法律演讲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议政修辞和法律修辞也随之不再重要，只有宣德演讲一枝独秀，成为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宣德修辞也因此成为修辞教育的主要内容，重词藻、重文采的风气应运而生，并一直延续到漫长的中世纪末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们对诗歌语言的重视，同时也得益于法国教育家 Peter Ramus 推行的教育改革，文体风格传统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几乎完全取代了人文传统。Ramus 把古典修辞学所总结的五艺里的前两艺（觅材取材和布局谋篇）划归逻辑学，又把第四艺记忆也剔除出修辞学的研究范畴。这样一来，修辞学关心的问题就只剩下文体风格和呈现这两艺（而呈现随着公开演讲作为一种交流手段也越来越不被重视），这一方面促成了辞格研究的繁荣兴旺，另一方面也埋下了19世纪下半叶修辞学走向没落的种子（顾曰国 1990：15）。

在 19 世纪后期，人文传统的修辞学研究几乎从西方的大学讲堂里完全消失，牛津、剑桥、爱丁堡、哈佛等大学都先后取消了修辞学教授一职，取而代之以文学或语言教授。与此同时，没有了人文传统与之相平衡的文体风格传统逐渐走向极端的形式主义，修辞学研究蜕变为费尽心机寻找新辞格和对已发现的辞格进行越来越细的分类。无怪乎人们对这种修辞学完全失去了兴趣（同上）。

进入 20 世纪后，人文传统和文体风格传统愈加分化，而且反映在术语上——用 rhetoric 来指称人文传统，用 stylistics 来指称文体风格传统。stylistics 是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文学作品的文体和风格的产物，在欧洲发展很快。相比之下，欧洲的人文传统则依然颓弱，只有少数学者（主要集中在比利时）仍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在大洋彼岸，人文传统力压文体风格传统，在言语交流、文学批评和文章写作这三个领域都方兴未艾，占据了修辞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同上：15—16）。

那么，这两大传统的并存和分野是否也体现在中国的修辞学发展中呢？从上一节对汉语修辞学史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汉语修辞学在先秦时期的萌芽与西方古典修辞学在古希腊的萌芽是很相似的，都植根于口语，服务于劝说（在中国主要是说客们向统治者进行游说，或诸子百家之间就某一话题展开辩论；在古希腊主要是在市议会发表演说，在法庭上进行诉讼和辩护，或不同流派的学者就某一话题展开辩论），强调修辞活动的社会性、政治性和目的性。换句话说，如同西方古典修辞学一样，汉语修辞学在萌芽时期也是主打人文传统的。

先秦诸子对论辩和谈说的社会功用有深刻的认识（易蒲、李金苓 1989：52—53）。例如，墨子就很重视论辩，墨家讲学除“德行、道术、从事”诸科外，还有“言谈、说书”两科（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在古希腊的雅典设学馆收学徒的智者派）。《墨子·尚贤上》称“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为“贤良之士”，并说这些“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墨子之所以重视论辩，是因为他看到论辩具有帮助民众明辨是非、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社会功能，正如《墨子·小取》所言：“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

孟子也重视辩说，并有“好辩”之称。他在《孟子·滕文公》中为自己的“好辩”做出解释：“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

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从中可以看出，孟子不是为好辩而好辩，而是怀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更进一步指出辩说具有“正道而辩奸”的功用。《荀子·正名》指出“故期、命、辩、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将辩说与治道和王业紧密联系起来。《荀子·非相》更旗帜鲜明地主张“好言”、“乐言”：“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

先秦时期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还从政治、外交、日常交际及个人的修身立命等方面对修辞的社会功能进行探讨。例如，孔子倡导“诗教”，《论语·泰伯》记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把诗、礼、乐看作道德修养的三个必经阶段。《论语·阳货》又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兴”指的是诗能够通过形象化的具体描写，引起人们丰富的同类联想，从而起到政治上的感染和教化作用；“可以观”是说通过诗，统治者不仅可以观察政治状况、社会风尚，还可以观察诗人作诗的目的和意图；“可以群”指的是诗歌可以团结民众；“可以怨”则是指诗人可以通过诗歌对统治者进行讽刺和批判（易蒲、李金苓 1989：36）。

孟子认为治理天下的人不能让“谀辞”、“淫辞”、“邪辞”、“遁辞”等“生于其心”，否则就会“发于其政，害于其事”。意思是说如果当政者染上了上述四种修辞弊病，对他们的执政会产生危害（同上：37）。

墨子同样强调修辞在政治上的作用。他在《非命下》中说：“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实将欲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在墨子看来，修辞不是雕虫小技，修辞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写说者的语言流利、文字漂亮，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社会、人民和政治。《墨子·尚同》进一步指出，“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惟口出好兴戎，’则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为谗贼寇戎。则此岂口不善哉？用口则不善也，故遂以为谗贼寇戎。”墨子所说的“用口”就是指运用言辞，他强调“善用口”的重要性，鼓励士大夫学会善用言辞，掌握修辞技巧（同上：37—38）。

关于修辞在外交上的作用，孔子多有论述，《论语》、《左传》和《周易》等都有记载。例如，《论语·宪问》谈到郑国起草外交文件的郑重：“为命，裨谿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

之。”也就是说，一份外交文件要经过起草、讨论、修饰、润色等多项程序，对文字、风格等反复打磨。正因为如此，郑国在外交上应对诸侯时“鲜有败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孔子对郑国外交成功的称赞：“仲尼曰：……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说的是郑国讨伐陈国获胜后，派子产到晋国报捷。因为子产言辞得当，晋国虽有心刁难，但最后也只能表态认可。所以孔子感慨修辞对外交辞令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上：38）。

此外，修辞对日常交际和个人修身立命的重要也被先秦诸子一再强调（同上：38—39）。例如，荀子非常重视语言的美感，认为优美的语言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荀子·大略》说：“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荀子·非相》说：“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周易·系辞上》则强调言行是君子进德修业的关键：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

进入两汉后，随着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的确立，游说和辩论都逐渐退出社会生活，汉语修辞学也一次性地永久脱离了口语，脱离了劝说，转而关注书面语修辞，强调表达的新颖、辞藻的华美和风格的锤炼。也就是说，如同进入中世纪的西方修辞学摈弃人文传统、推崇文体风格传统一样，汉语修辞学从两汉时期开始也从人文转向文体风格。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在西方，人文传统虽历经波折，却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并且在20世纪的美国得以重振；而在中国，人文传统自两汉以后几乎再无人提起，直至当代，我们所讲的“修辞学”仍是专指文体风格传统的书面语修辞学。

### 3

## 本书所讲的修辞学

在第一节末我们已经指出，本书以介绍英语修辞学为主，辅以汉语修辞学的一些独特观点，着重运用修辞学理论对体现在不同文体中的英语和汉语的修辞现象进行分析。在全书的写作中，笔者希望有机地融合人文传统和文体风格传统，而不是将二者人为地割裂开来。

简单地讲，笔者认为修辞学是研究如何让语篇最有效、最得体地服

务于写说者的目的及其所承载的用途的学问。修辞学所关注的语篇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可以用于传播知识 (to inform)，也可以用于劝说或鼓动 (to persuade or motivate)；语篇的接收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

这样一来，修辞学关注的范围就很广了，几乎可以说涵盖了人类全部的语言交流行为。不过，修辞学家们习惯于将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即兴的、随意的、非正式的口头交流形式（如客套的寒暄、讲笑话、打招呼、聊天、简单的说明等）排除在修辞学领域之外。这并不是说日常的你来我往的对话形式不能承担资讯、劝说、鼓动等交际功能，只不过传统上修辞学所关注的是比较正式的、经过深思熟虑、有一定长度的演讲或文章（如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竞选感言等）；演讲者或文章作者力图通过自己的言语或文字给听众/读者施加某种影响 (to exert an effect on an audience)，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Corbett 1990: 3)。

由此推而广之，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也是一种正式的、经过作者和编导等主创人员深思熟虑、有相当长度的修辞语篇，是作者和编导通过特定的故事、情节、人物、背景等完成的一种特殊的修辞行为。作者和编导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影响读者和观众：让他们打开一本书，或走进影院/打开电视机，带着各自的心情读书、观剧，在阅读和观赏过程中或被人物的命运所打动，或被复杂的情节所吸引，微笑、流泪、思考、质疑，并在阅读和观剧结束时，成为一个“被改变了的人” (a changed person)，尽管这种改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给听众/读者/观众施加某种影响是修辞的关键所在。很多关于修辞的定义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这一点，我们从第一节所列举的一些西方学者对修辞和修辞学的界定中对此已有所了解。在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的经典定义里 (the faculty of discovering all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 in any given situation) (*Rhetoric* 1.1, 1355b: 25—26)，修辞给受众可能带来的影响似乎被限定为“劝说” (persuasion)，但其实在古希腊语里，persuasion 一词源于动词“to believe”，如此一来，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定义也可以做更广泛的理解，既可以涵盖力图劝说受众接受某种政治观点、进而采取某种政治行动的政论性质的 (argumentative) 文体，也可以涵盖向受众传递某种知识或传达某种情感的解说性 (expository)、描述性 (descriptive) 或抒情性 (expressive) 文体。

关于修辞的目的，18世纪苏格兰著名修辞学家 George Campbell

(1963) 总结得很好，那就是“启迪思维，愉悦想象，感动激情，影响决断” (to enlighten the understanding, to please the imagination, to move the passions, or to influence the will)。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各种修辞策略 (strategy) 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策略，就是从现有的、可以动用的资源中挑选出最合适材料，并加以恰当的组合，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既定目标。策略一词容易让人想起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将军所采用的战略，其实在古希腊语中 strategy 一词的确起源于 army。如果说一个将军所寻求的是运用最恰当的战略战术指挥部队打败敌军、取得胜利的话，那么一个修辞者 (演说者、作者、导演等等) 所企盼的便是以最合适的方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并以最得体的方式和风格将自己的作品呈现在受众面前，以期“赢得”受众 (Corbett 1990: 5)。

修辞行为在当代社会里可以说是无孔不入：课堂上，老师苦口婆心地劝学生认真听讲，是一种修辞；饭桌上，孩子希望父母周末能带他去海洋公园，是一种修辞；小伙子向心爱的姑娘表明心迹，恳求对方接受自己的感情，是一种修辞；敬业的员工向老板进言，慷慨陈词公司内部改革的重要性，是一种修辞……不过，修辞策略运用得最如火如荼的地方是广告。广告顾名思义就是广而告之。它是“为了某种特定的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媒体，并消耗一定的费用，公开而广泛地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宣传手段” (百度百科，“广告”词条)。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则广告，看看广告设计者运用了哪些修辞策略来实现占领市场、推销产品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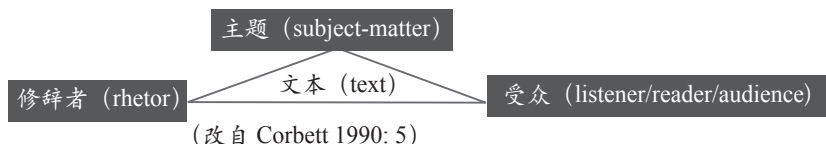
### 3.1 一则广告的修辞分析

用修辞学的术语来说，广告是一种典型的劝说性语篇。单就商业广告而论，其目的无非是告知消费者有关一种产品或一种服务的信息，并劝说消费者购买这种产品、接受这种服务，从而让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服务的提供者最大限度地盈利。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逃脱广告影响的年代，放眼望去，广告铺天盖地：报纸、杂志、传单、巨幅广告牌，这些还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平面媒体广告。更有借助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传播的音频广告、视频广告等等。广告的无处不在和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促成了广告业的应运而生，而广告策划者则成为当代社会最娴熟的修辞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从未接触过修辞学理论，却能有效地运用这门古老艺术所传授的种种修辞策略来影响目标消费者的态



度和行为。

我们不妨将修辞行为所涉及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交流三角”（communication triangle）的形式做一个直观的展示：



如图所示，一个完整的修辞行为包括修辞者一方和受众一方，修辞者通过呈现一个文本（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或影像的，等等）来传达一个或多个主题，以达到影响受众的目的。修辞者可以是说者、写者、创意者、表演者等等，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角色重叠在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一个修辞行为由一个人创意、策划、完成并执行；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角色由不同的人承担，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演讲就不是由他自己执笔的，这时就出现了创意者和演说者并不重叠的情况；再如一部电影的创作牵扯到编剧、导演、制片、摄影、配乐、演员等多方的合作，所以如果将一部电影视为一个庞大的修辞行为的话，那么它背后的修辞者是一个团队，而不是个人。修辞行为的受众可以是听者（例如现场聆听演讲的人）、读者（例如阅读一本书的人）或者观众（例如观看一部电影的人），受众的构成也可以非常复杂：以一部电影为例，它的受众既包括那些买票进电影院老老实实看完电影的人，也包括那些以其他方式（电视转播、网上下载、DVD等等）部分或全部观影的人，还包括那些虽未观剧、但是通过一些方式（看影评、看内容介绍、听别人谈论，等等）了解了该电影的人。

在大部分广告里，修辞者究竟是谁是最不容易说清楚、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一般说来，大多数广告都是某产品的生产厂家或某服务的提供者雇用广告公司的专业人员来设计的，换言之，一则广告的背后通常有一个创作团队；而真正在广告里出镜、直面受众的所谓“形象代言人”未必真的参与了广告的创意和广告词的设计。总之，在修辞者的明晰程度这一点上，广告有别于日常会话（说者是谁一目了然）和普通的文章写作（作者是谁也比较明朗）。

下面请看一则刊登在 2008 年 9 月 29 日出版的《新京报》上的商业广告：


例1 伊利广告

伊利报告

# 伊利郑重承诺

## 伊利“放心奶”大行动， 让您喝的每一包伊利牛奶都是放心奶

自9月17日起，市场中的伊利牛奶经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已完全合格，消费者可放心饮用。



9月11日“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来，伊利为弥补安全疏漏，让消费者喝上放心奶，在全国展开“伊利放心奶”系列大行动。

“三保三清”行动保障市场产品的安全，发现一包销毁一批  
50,000多名员工直接参与，4,000多名监察人员进驻全国各地产品售卖点，引进700多台检测设备，对2,000多批次产品彻底排查，并将所有品种送达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地方检测机构进行双重检验。

新出厂的产品24小时全程监控，合格一批出厂一批  
从原料奶收取到各个生产流程，再到物流配送，每个环节严密排查。

为了对每一位消费者负责，为了让您天天都能喝上放心奶，伊利在行动！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ww.yili.com](http://www.yili.com)  
(《新京报》2008年9月28日A21版)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则广告，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点背景知识。2008年9月11日，卫生部公布，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

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卫生部专家指出，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石。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后国家质检局对国内乳品企业生产的奶粉和液态奶等进行全面排查，蒙牛、伊利、光明等知名免检品牌均有一些批次的奶制品被查出含少量三聚氰胺。一时间，国内乳品企业陷入消费者的信任危机。

伊利公司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通过电台、电视台、报纸等媒体推出这则名为“伊利报告”的广告的，我们所引述的是出现在报纸上的平面版本。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庞大的修辞行动，首先让我们来确定构成这一修辞行动的交流三角的各个要素。这一广告并没有启用某位具体的形象代言人，而是以伊利公司的口吻展开陈述。广告词里几个关键句子的主语都是“伊利”，如开头的“伊利郑重承诺”，中间的“伊利为弥补安全疏漏……在全国展开‘伊利放心奶’系列大行动”，以及结尾的“伊利在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在广告中正面出现的“伊利”并不是一个模糊、暧昧、捉摸不定的抽象机构，而是一个表现出决心、勇气和诚信的团队，这一点体现在“伊利郑重承诺”、“伊利在行动”等句式上，也体现在“50,000多名员工直接参与，4,000多名监察人员进驻全国各地产品售卖点，引进700多台检测设备，对2,000多批次产品彻底排查”等数据和数据后直面问题的伊利人身上。在修辞学研究中，隶属于修辞者的特性、气质、道义、信仰等被称为修辞者的“个人形象”(ēthos)。这则广告之所以急于建立伊利公司有决心、肯承担的ēthos，正是因为毒奶粉事件后伊利公司原来相当正面的形象瞬间倒塌。

那么这则广告的受众究竟是谁呢？我们当然可以笼统地回答是每一个看到这则广告的读者，但是读者与读者之间在年龄、职业、地域、教育程度、性情、奶制品的消费态度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回答这则广告针对的是乳制品的潜在消费者(potential consumer)，不过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同样存在巨大差异。在广告正文中，受众两次被尊称为“您”（“让您喝的每一包伊利牛奶都是放心奶”，“为了让您天天都能喝上放心奶”），还有三次被描述为“消费者”（“消费者可以放心饮用”，“让消费者早日喝上放心奶”，“为了对每一位消费者负责”）。“您”似乎是直呼那个正在浏览广告的你，这种直呼形式显然缩短了“伊利”和“你”之间的距离；而“消费者”则似乎涵盖了除了你之外其他所有可能对伊利乳制品感兴趣的人，这就拓展了这则广告意欲面对的受众。笔者相信广告中第二人称代词的尊称形式（“您”而不是

“你”）和第三人称名词短语的同时使用应该不是广告策划者的随意之举。

下面再来看看这则广告涉及的主题（subject-matter）和承载及体现主题的文本（text）。广告的主题是伊利公司承诺市场上销售的伊利牛奶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规定，请消费者放心饮用；文本则是在三鹿奶粉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天出现在《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主流媒体上、占半幅版面的平面广告。该广告文本首先引起读者注意的应该是它的绿色基调，除了整幅广告配绿色边框外，共有五行承载最重要信息的文字也采用绿色字体，包括开头四行的“伊利报告”、“伊利郑重承诺”等。在食品行业，绿色通常携带环保、安全、不添加农药化肥等正面意义，所以绿色的选择应该是经过广告策划者深思熟虑的。在绿色基调中有两抹红色格外抓人眼球，一处是左上角的伊利商标（“伊利”二字为红色），一处是正中间的“放心奶”标志，一颗红心上赫然印着“放心奶”三个蓝色字。两处标志所占空间均不大。这种版面布置不仅避免了通篇绿色的单调，也以不太张扬的态度提醒读者关注和信任正在经历信任危机的伊利公司。

整篇广告中最大号的字体给了“伊利郑重承诺”，然后是“伊利‘放心奶’大行动，让您喝的每一包伊利牛奶都是放心奶”。这三行合起来其实是一句话，也是这则广告希望能深入读者心中的主旨。这可以说是一种开宗明义的做法，广告策划者之所以没有选择使用一些更婉转曲折的方式来传达这一信心，恐怕是因为在毒奶粉事件后消费者信心全失的大环境下，任何看似聪明的文字游戏都只会增添消费者的反感。不过，广告策划者仍然在巧妙运用修辞策略进行游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便是数字的运用，例如强调9月11日和9月17日两个日期（前者是“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的时间，后者是伊利牛奶经检查完全合格的起始日）；强调“三保三清”和“发现一包销毁一批”；强调“新出厂的产品24小时全程监控，合格一批出厂一批”；强调“50,000多名员工直接参与，4,000多名监察人员进驻全国各地产品售卖点，引进700多台检测设备，对2,000多批次产品彻底排查”。广告策划者之所以罗列这些数字，是因为数字通常比文字说明显得更直观、客观、有说服力和专业水准。

至于伊利广告正文所体现的风格特点，首先是长句为主，兼顾短句。这则广告由八个句子组成，字数分别是30、42、49、23、80、21、27和29，最长的句子为数字密集排列的第5句，句子的平均长度为

37.625 个字。最长的第 5 句同时体现了该广告在句式上的第二个特点，即排比句的使用：第 5 句有 4 个含阿拉伯数字的短句并列在一起，第 7 句的前半部分“从原料奶到各个生产流程，再到物流配送”是两个动词短语的排比，而最后一句的两个“为了”是状语从句的排比。长句相对短句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也可以加重语气的凝重和庄严；排比句突出的是一种气势和决心。考虑到这则广告推出的特殊时间，这种句式上的安排应该也是广告策划者们的有意为之。

除了长短句相结合和排比句的运用，这则广告在风格上的另一大特点是语言平实，选用最日常、最普通的词汇，极少装饰。在全部八句话共 301 个字里，没有出现任何生僻、复杂的字，形容词用得很少，副词也只出现了六个，分别是最普通的“郑重”（郑重承诺）、“完全”（完全合格）、“放心”（放心饮用）、“直接”（直接参与）、“彻底”（彻底排查）和“严密”（严密排查）。单看这则广告，也许我们对这一特点还很难体会，但若是将这则广告与一些流行的化妆品广告、汽车广告、酒类广告等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后面这些广告在语言风格上通常要华丽得多。

虽然只有八句话，但是这则广告还是可以区分头、中、尾三个部分，分别是：

- 承诺每一包伊利牛奶都是放心奶。（第 1—2 句）
- 介绍“伊利放心奶”系列大行动的具体步骤。（第 3—7 句）
- 再次强调伊利在行动。（第 8 句）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则广告虽然简短，但结构相当精密、完整。在开宗明义之后，随即在广告的主体部分提供证据（也就是修辞学中所说的 proof），告诉消费者伊利为何能做这样的“郑重承诺”，以及为了实现这一“郑重承诺”，伊利采取了哪些果断的措施。最后再次强调，“伊利在行动！”，照应开头，同时也是进一步彰显决心。

笔者以为，这则广告最令人动容的地方恰恰是末句的“伊利在行动！”。这句简洁的口号有一种掷地有声的效果，让人感到在面对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时，一个大企业的痛定思痛。当然，判断这则广告是否成功，最终还是要看有多少读者接受了广告所传达的信息，愿意相信伊利公司的承诺，并重新开始或继续选购伊利牛奶。这里不妨也指出这则广告在修辞上的几个疏漏之处：第 3 句话末尾的“在全国展开‘伊利放心奶’系列大行动”似乎应改为“在全国开展‘伊利放心奶’系列大行动”，因为“展开”作及物动词时，很少搭配“行动”；与“行动”搭配

的及物动词一般是“开展”。另外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是通篇广告所采用的第三人称口吻，这并不是广告策划者唯一的选择，还有一个选择是采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即自称为“伊利”）显得郑重、庄严，但同时显得疏离；第一人称（即自称为“我/我们”）显得亲切、温和，但同时也显得随意。在三聚氰胺事件所引发的乳制品业的信任危机里，是打积极礼貌牌更能赢得人心还是打消极礼貌牌<sup>1</sup>更有说服力呢？这恐怕是广告策划者和公司决策者必须思考的问题。还有一点，即第5句所列举的数字都是约数，而不是精确的数字，这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的效果？

之所以在此节花相当的篇幅来分析一则广告，是因为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次修辞行为会涉及哪些方面，以及本书将要尝试的修辞批评究竟会如何展开。

## 练习1

下面是埃森哲（Accenture）公司推出的一则英文广告，刊登在2009年3月9日的 *Wall Street Journal* 上。埃森哲公司是一家世界知名的管理咨询、技术服务和外包机构，其定位是“帮助客户确定战略、优化流程、集成系统、引进创新、提高整体竞争优势，从而成就卓越绩效”<sup>2</sup>。请你试着从修辞者、受众、主题、结构、风格等角度对这则广告进行修辞分析。

We face a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But while some organizations struggle to survive, others will emerge even stronger. How can you give your company an edge?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s, based on your unique strength, is more critical than ever. Whether your goal is maintaining your market position or improving it, flawless execution is a must. Having worked for decades with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companies—through up cycles and down—we have the experience to help you come out on top. At a time when it's

1 “消极礼貌”和“积极礼貌”是语用学中的两个概念，前者指顾及对方的负面面子，表现出尊重；后者指顾及对方的正面面子，表现出亲密。参见蓝纯（2007）。

2 来源：<http://www.accenture.com>；访问日期：2010-1-22。

tougher than ever to be a Tiger, it's even more crucial to know what it takes. Talk to us to see how we can help.<sup>1</sup>

### 3.2 诸葛亮舌战群儒

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以广告为代表的目的明确、深思熟虑的修辞行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其实不然。我们在第2节已经看到，在西方，修辞现象的出现和修辞理论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在中国，汉语中的修辞现象也早在汉语诞生时就已产生（易蒲、李金苓 1989：29）。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汉语修辞的例子来自大多数读者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在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和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中，曹操统军百万，兵临城下，孙权面临是降还是战的艰难抉择。文官武将轮番上场游说，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修辞策略和技巧的大比拼。在下面的节选中，我们把关注点放在鲁肃、诸葛亮和周瑜身上。这三位都是主战派，但是他们劝说孙权与曹操决一死战的方式却很不同。

#### 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

- 1 却说鲁肃、孔明辞了玄德、刘琦，登舟望柴桑郡来。二人在舟中共议，鲁肃谓孔明曰：“先生见孙将军，切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孔明曰：“不须子敬叮咛，亮自有对答之语。”及船到岸，肃请孔明于馆驿中暂歇，先自往见孙权。
- 2 权正聚文武于堂上议事，闻鲁肃回，急召入问曰：“子敬往江夏，体探虚实若何？”肃曰：“已知其略，尚容徐禀。”权将曹操檄文示肃曰：“操昨遣使赍文至此，孤先发遣来使，现今会众商议未定。”肃接檄文观看。其略曰：
- 3 “孤近承帝命，奉词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速赐回音。”
- 4 鲁肃看毕曰：“主公尊意若何？”权曰：“未有定论。”张昭曰：

1 这则广告的收集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语言学专业2008级研究生闫建设、张超、郑霞、赵洁。在此致谢！

“曹操拥百万之众，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顺。且主公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既得荆州，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势不可敌。以愚之计，不如纳降，为万安之策。”众谋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孙权沉吟不语。张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则东吴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孙权低头不语。

5 须臾，权起更衣，鲁肃随于权后。权知肃意，乃执肃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肃曰：“恰才众人所言，深误将军。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权曰：“何以言之？”肃曰：“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将军宜早定大计。”权叹曰：“诸人议论，大失孤望。子敬开说大计，正与吾见相同。此天以子敬赐我也！但操新得袁绍之众，近又得荆州之兵，恐势大难以抵敌。”

6 肃曰：“肃至江夏，引诸葛瑾之弟诸葛亮在此，主公可问之，便知虚实。”权曰：“卧龙先生在此乎？”肃曰：“现在馆驿中安歇。”权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见。来日聚文武于帐下，先教见我江东英俊，然后升堂议事。”

7 肃领命而去。次日至馆驿中见孔明，又嘱曰：“今见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笑曰：“亮自见机而变，决不有误。”肃乃引孔明至幕下。……

8 ……引至堂上，孙权降阶而迎，优礼相待。施礼毕，赐孔明坐。众文武分两行而立。鲁肃立于孔明之侧，只看他讲话。孔明致玄德之意毕。偷眼看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说。等他问时，用言激之便了。”

9 献茶已毕，孙权曰：“多闻鲁子敬谈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见，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无学，有辱明问。”权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必深知彼军虚实。”孔明曰：“刘豫州兵微将寡，更兼新野城小无粮，安能与曹操相持。”权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马步水军，约有一百余万。”权曰：“莫非诈乎？”孔明曰：“非诈也。曹操就兖州已有青州军二十万；平了袁绍，又得五六十万；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万；今又得荆州之军二三十万；以此计之，不下一百五十万。亮以百万言之，恐惊江东之士也。”

10 鲁肃在旁，闻言失色，以目视孔明，孔明只做不见。权曰：“曹